

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

李辉凡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5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

统一书号：10378·149 定价：2.60元

编者序

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新概念是高尔基和卢纳察尔斯基等首先提出的。高尔基比其他作家更早更充分地表达了人道主义的新观点，他的有关文学的人道主义的言论以及对它所下的定义成了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和牢不可破的传统。

因此，在论述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问题时，当然首先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概念谈起。如所周知，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活动始于新型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正面解决之前。早在上世纪末，高尔基刚刚步入文坛时，就把人的问题——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人的前途，置于自己的注意的中心。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中，便以与主人公安谈的方式，提出了，“得学习，得教人”的主题。稍后，在《读者》（1896年）一文里，他进一步指出：“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感、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的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公式。”^①

随着时代的步伐，高尔基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新人——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期待着在无产阶级中产生无愧于新世界的主人公。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高涨年代，他满怀豪情地欢呼新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的出现。1903年，他写了一篇哲理性的诗篇《人》，其中的主人公就是这位象征性新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这个人庄严宣告：他的使命“就是照亮整个世界，融化世

^①《高尔基文集》中文版，第2卷第290页

上神秘之秘的黑暗，找到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和谐，建立自己内心的和谐……我坚决反对那种无所企求的可耻的精神状态，我要每个人都成为人！”①几年后，高尔基写出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作——《母亲》。作品的一位主人公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人们互助敬爱，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象一颗明亮的星的时候，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候，人人都真诚坦白……到那时候，人们是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之中。”②

可以说，高尔基的全部艺术创作，就是一支新人和新的人道主义的赞歌。他以文艺为武器，把毕生献给了为人的自由和幸福、为人类的解放和新生而作的斗争。他把文学称为“人学”，正是强调文学的这种人道主义的作用和性质。他以其全部艺术经验和生活经验指出：“文学是最富于人文特征的艺术。可以把文学家称为职业的爱人者和人道主义的生产者。”③

诚然，高尔基关于人。人道主义思想和概念，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他的一系列言论和文章（《米哈依尔·维隆诺夫》、《一个读者的札记》、《弗·伊·列宁》、《致人道主义者》、《文化大师们，你们跟谁站在一起》、《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论文化》等）可以看作是他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上的总结。高尔基把苏联文学的这种新型的人道主义定名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不同，“除了人道主义这个词外，这两种人道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词是一样的，可它们的真正内容却已经截然不同。”④毋庸讳言，高尔基晚年在强调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革新性质时，有些场合过分地注意了旧人道主义的消极方面，有时几乎完全否定了旧人道主义的积极的一面及其传统。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整个地说，高尔基在苏联文学中确立的人道主义概念是正确的，它有着永久不衰的生命力。

在二十年代，能够理解高尔基并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相通的，恐怕只有沃隆斯基、卢纳察尔斯基等少数批评家。沃隆斯基没有很多人道主义的言论，但他是赞同高尔基的。卢纳察尔斯基早期受过实证主义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他接受了列宁主义。卢纳察尔斯基也没有从正面给人道主义下过定义，他是在同柯罗连科的论争性的意见中表达他的人道主义概念的。柯罗连科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无疑有着严重的分歧，他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但他无成见。1924年卢纳察尔斯基在《符·加·柯罗连科》一文中对这位作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柯罗连科是一个美丽的、绝对端正的、非常透明的结晶体，其中包含着旧时知识分子身上一切典型的、良好的东西。”他的非凡的写作才能和艺术禀赋，使他能够在俄国生活的考验中“维持着优美的内心的平衡”。但是，柯罗连科不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他不可能“从美学上理解革命”，因为“真正的革命一定是毛毛糙糙的”。其次，柯罗连科“在道德上也不能接受革命”。这不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否定兄弟之爱的道德”。主要因为，在道德方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把仁爱准则当作一种“马上就建立起来的，仅仅取决于人的善良心愿的事物”，在他看来，“人人都可以变成白鸽”。而革命者则认为，第一，在今天，讲求君子之道非常困难；第二，在今天的条件下，不能羡慕正人君子，因为正人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了解，“仁爱是要求用牺牲来抵偿的”^⑤。尽管这样，卢纳察尔斯基还认为，“从柯罗连科那儿，从那美丽、纯洁、莹亮、温柔、温暖的人道主义中汲取教益，将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

①《高尔基文集》第5卷第54页。

②同上，第11卷第153页。

③高尔基文献资料。

④《高尔基政论散文集》，三联出版社，1982年第707页。

⑤见《卢纳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25—228页。

我们的胜利愈巩固、愈广泛，柯罗连科对我们来说就愈有价值”^①。显然，卢纳察尔斯基是反对抽象人道主义的，但他并不是反对一切人道主义，哪怕是柯罗连科式的人道主义，也认为可以取得教益。苏联批评家库尔吉尼扬曾经对卢纳察尔斯基上述言论作了分析，得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他认为，卢纳察尔斯基所表达的观点，“为考察人道主义概念的三个角度打下了基础：一是历史的思想的角度；二是伦理道德、全人类的角度；三是艺术独具的美学角度。”^②的确，尽管卢纳察尔斯基本人也许没有这么具体的划分，但所提示的论点却是十分明确的。特别是表现在上述言论中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后来的苏联文学批评有着明显的影响。

一

在苏联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我们同时也看到一种反人道主义的思潮。例如苏维埃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二十年代的列夫派等，他们从庸俗社会学的或者极“左”的主张出发，否定、反对文学的人道主义性质。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美学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条：机器主义、宇宙主义、集体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学面对的不是人和人们的生活，而是机器、技术。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加斯杰夫写道：“对新的产业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心理和他们的文化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工业本身。厂房、烟囱、圆柱、桥梁、起重机、新建筑物和企业的复杂构造、频繁发生的大事故和机器的不断运转——这一切就是渗透到无产阶级日常意识中的东西。”^③他们高喊“艺术电气化”、“艺术劳动工程化”。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任主席普列特尼约夫公开说：“新世界的造型艺术将是一种生产艺术，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这里，为了艺术家的‘我的直观、灵感、神圣的艺术等等，有人会大吵大嚷起来。这些都不过

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摇篮上的小玩意而已。”④他们还提出一种所谓的“特殊的集体思维”，即认为无产阶级艺术都是一种集体创作，文学作品中只能用“我们”而不能出现“我”字，“我”只能代表“个人主义”。普列特尼约夫甚至提出“一元论思维”的口号，他写道：“个人主义感受的公式让位给群众运动，文学创作的背景扩大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概括地、一元论地思维的能力现在变成艺术家这样一种需要，就如同需要呼吸、吃喝一样。”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人都坚决拒绝写抒情诗，因为抒情作品被完全看成是“个人感受”，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二十年代的一批“列夫”批评家和理论家也竭力鼓吹“生产文学”，要求文学直接起物的作用，否定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为了根除文学的“神秘化”，他们要把文学家改称“工匠”，把艺术创作改称为“工作”。一位“列夫”批评家公开撰文宣布：“应该给文学提出的任务是：不是反映人，而是反映事业；不是写人，而是写事业；不是对人感兴趣，而是对事业感兴趣。我们不是根据人的感受来评价人，而是按他在我们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于事业的兴趣对我们来说是主要的，而对人的兴趣是派生的……高尔基的公式：‘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⑥

公开反对写人，要求文学的非人道主义化的倾向，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是有代表性的。从革命胜利起直至三十年代初，

①见《文学问题》1970年第7期第44页。

②库尔吉尼扬《当代苏联批评中的“人道主义”概念》。

③《无产阶级文化》杂志，1919年第9、10期合刊第44页。

④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文版，卷2第780页。

⑤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文版，卷2第781页。

⑥《新列夫》杂志，1928年第5期第4—5页。

在苏联文艺界，人道主义问题几乎是一个“禁区”，批评家反对它，作家们不敢接触它。偶尔有个别作家牵涉到这个问题，也多半受到抨击。例如，卡达耶夫和普拉东诺夫等，都因某些作品的人道主义问题而受到批判（如卡达耶夫的《牛奶》等）。

在苏联文学发展过程中，人道主义问题第一次受到重视并引起公开讨论是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在这次大会的主报告中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在讨论过程中，许多作家、批评家也专门谈到了人道主义问题。苏尔科夫在大会发言中激动地指出：“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词获得了全部公民权，不久前我们对这个词还是不信任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敌视的。这个词就是人道主义……而现在已经把这个词引进我们日常生活中了。”①

但是，我们也看到，人道主义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受法西斯战争的威胁已日趋明显。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当然不能离开这个时期的社会形势。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人们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其最强音无疑是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所强调的自然是人道主义的正义性和战斗性方面。苏尔科夫的发言中强调指出，人道主义除了爱、欢乐和自豪外，还有第四方面的内容——

“仇恨”。他号召作家们要“保持抒情火药的干燥”。作家奥列沙在发言中曾谈到：“共产主义不仅是经济体系，而且也是道德体系”，“对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态度也是最纯洁的人道主义态度”；“我的富有，就表现在我知道长满青草、充满晨曦、绚丽多彩的世界是美丽的……”②即使是这样的带点抒情性的发言，也受到一些与会者的非议。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立即提醒他说：

“我的朋友奥列沙和所有跟随他的人，你们写水晶般的纯洁，写爱，写温情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可是与此同时我们时刻应当……十分熟悉征兵登记处这个地方，一旦有必要，我们都应前去报

到。”③

从三十年代中期起直至卫国战争和战后一段时期，苏联作家、批评家在阐述人道主义问题时，一般都偏重强调它的战斗性，或是直接与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法捷耶夫在《苏联文学》（1938年）一文中写道：“苏联文学从古典文学那里象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那样接过了人道主义旗帜，但却是新型的人道主义旗帜……旧俄文学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起，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止，都培养起对被欺凌和被侮辱者的怜悯和同情的感情，但却看不到使人类摆脱贫困、无权和受辱的种种痛苦的道路。和这些人道主义者不同，马克西姆·高尔基第一个塑造了同社会不公平作斗争的战士的形象，以斗争的幸福而自豪的人的形象……这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人道主义。这种在斗争中产生的人道主义，对于当代整个苏联文学来说，都是典型的。”④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我们有义务高声发出人道主义这一伟大的声音去反对战争贩子，因为构成全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千百万普通人等待着我们这样做。”⑤列昂诺夫、肖洛霍夫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也贯穿着这样的人道主义精神。肖洛霍夫在卫国战争期间，曾特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其标题就是《学会仇恨》（1942年），旨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动员人民去仇恨敌人，反对战争。

无疑，上述的人道主义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人道主义宣传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过，就人道主义本身而言，如果只是强调它的某一个方面的意义，那么，

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速记稿，1934年第513—514页

②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36页

③同上，第285页。

④法捷耶夫《三十年间》

⑤法捷耶夫在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说，1949年。

这种人道主义就显得狭窄了，甚至片面了。特别是到了战后，斯大林执政的后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斯大林提出过所谓社会愈向社会主义发展，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理论，结果导致肃反扩大化以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这些情况自然也不可能不反映在苏联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因此，虽然在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界开始注意人道主义问题，但应该说，直到五十年代末，文学的人道主义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和足够的重视，对人道主义本身的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研究和阐释。关于这一点，苏联批评家盖伊曾明确指出：“在个人迷信时期，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是有困难的。论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叶赛宁和其他苏联作家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书籍和文章逐年减少，而在战后时期，这类书籍和文章就根本不再出现了。当斯大林的关于随着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便愈尖锐的论点日益广泛流行，当维辛斯基在其著作中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的时候，是很难论述全人类的东西和个人的人的价值的。”①

二

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与苏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前在苏联文学中人道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全面的研究的话，那么，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却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潮。这股热潮的起因无疑是与当时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联系在一起的。特瓦尔朵夫斯基曾指出，可把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称作“苏联文学的复苏”时期，“解脱某种桎梏或束缚的时期，这种桎梏或束缚是由于与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反人道主义现象而留给苏联文学的。”②批评家捷明季耶夫

也说过：“仁慈、善良——被人歪曲成庸俗自由主义的论调……在个人迷信时期，竟无条件地贬低这些词汇，以至于就其实质来说，几乎是消灭了它们。而现在，个人迷信已经消除，党纲上已经宣告：‘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难道我们还应该把这些概念，这些词送给我们的敌人吗？不言而喻，应该赋予它们以真正人道主义的和真正现实的意义，并且将它纳入我们的精神和思想武库中。”^③原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阿尼西莫夫也认为，在个人迷信时期，人道主义往往成了具有“单纯官方意义的公式”，结果，人道主义观念的真正内容却因而丧失殆尽。“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基础上，我们重新回到了人道主义的各种概念上来，以便在其全部复杂性上去把握它们，并从中获得其一切内在的涵义。”^④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62年苏联作家协会与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人道主义问题与现代文学”的大规模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作家、批评家外，还有其他学科、行业的人。他们就人道主义方面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会议发言看，主要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批判个人迷信时期不重视人，把人当作“螺丝钉”，当作“燃料”，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等不人道的观点。捷明季耶夫写道：“近年来文学加强了对普通人的注意，对他们的需要、要求，他们的人的尊严的重视……而在个人迷信时期，普通人的作用有时被贬低为‘螺丝钉’的作用。可是，要知道，我们的‘小人物’——这就是大人物”（《人道主义的丰富性》）。鲍列夫也

①《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莫斯科，1983年。

②特瓦尔朵夫斯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捷明季耶夫《人道主义的丰富性》，见《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莫斯科，1983年。

④阿尼西莫夫《人道主义与行动》，同上书。

指出，不能把人看作是历史的燃料，这是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与共产主义思想实质相敌对的。“不！人不是历史的燃料，这种燃料烧得一点不剩，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动力”（《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盖伊和皮斯库诺夫在其合写的《当代人物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里批判了“让人牺牲吧——只要事业胜利就好了”的论点。这两位批评家赞扬了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和斯捷尔玛赫的《人血不是水》等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正是反对这种观点的：“肖洛霍夫与斯捷尔玛赫用他们的全部才华的威力，激烈反对这个轻率而没有深思熟虑的‘让人牺牲’的见解，激烈反对冷酷无情”，“两位艺术家同时都为反对忽视个人，把人理解为达到目标的手段而斗争”（《苏联文学的美学理想》）。诺维钦科则称颂了立陶宛诗人梅热拉依季斯的诗集《人》，认为诗集“反映了我们时代思想生活的一个特点：我国的人道主义哲学已摆脱了不久以前的所有各种各样的异己的杂质……这就是枯燥和忧郁的功利主义。”“从外表看，它好象是完全合乎时代精神的，而实际上则是把人变成国家机器的麻木的小螺丝钉。这是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把精神贫乏、单调看作是新社会意识的特点的倾向。”（《我是人，我是共产党人……》）

二、认为新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价值。

批评家吉斯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人道主义就是对个人的人格の无限尊敬。确立人的生活价值——无论是部长还是邮递员的生活。①谢尔宾纳写道：“人的个人的本身价值和重要性问题，今天被提到了首位，这是很自然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假人道主义概念之间的最深刻的分界线之一——就是明确倾向于艺术上再现个人的重要意义，假人道主义概念是从人的微不足道和必遭灭亡的错误思想出发的。”（《现代文学中关于人的观点》）叶尔米洛夫在《论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文里，重点分析了个人因

素和全体因素问题。并指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没有可以代替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做出某种他自己的、只有他所固有的贡献。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肯定个人的独特性这个原则，个人是唯一的、仅有的价值这个原则。”

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就是宣传人性、善良、仁慈……。作家艾特玛托夫指出：应该在人的身上培养善良，这是各代人的共同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艺术的任务……人实质上生下来就是一个潜在的人道主义者，他从不知道“人道主义”这个术语的幼年时代起就学习善良——他从对母亲、对自己的亲人的爱，从对女人、对自然、对土地的爱，上升到后来对祖国的爱、自觉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的怜悯、团结、互助的感情。人向人学习善良，人的这些品质将永远使艺术作品具有丰富的内容。（《人向人学习善良》）批评家谢尔宾纳、艾里斯别格、什屠特等也多次强调：“象善良、同情心、忠诚、魅力这样一些概念，有时被看作与我们的革命性格不相容的东西，因此正面人物常常被想象成一个严厉的、粗鲁的、失掉了人的魅力的人。”“人性、善良、关心人的崇高美德是无容争辩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它们的价值。”②作家梅登斯基在“人道主义问题与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也明确提出：“善意的话，善意的事，纯朴的同情，关心，劝告，责备，揭露，惩罚，呼吁，良好的范例，即一切为我们开辟通往心灵的道路，鼓舞他，使他有力量，使他相信自己、相信生活、相信真理和正义必然得胜的东西。所有一切都将是人道主义。”（《为人而斗争的人道主义》）

诚然，在这次讨论会上，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什屠特认为，在个人迷信时期，仁慈一类的品德被打入冷宫，现在是需要

①见《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综合报道，《文学问题》1962年第11期。

②《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莫斯科，1963年。

纠正它。“必须大力维护，但也不能过分。我们不能用新的偏差来纠正旧的偏差”；“善良，毋庸置疑是非常崇高的，但它的作用毕竟有局限”。善良并不一定永远获得正确的效果。高尔基在《底层》里提出了迫切问题：是同情还是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是由于它的正确，而不是因为它仁慈，空想社会主义也很仁慈。因此，“在讨论理性与心灵何者更优越的这场辩论中，我们赞成维护理性的意见。”（《人道主义的睿智》）阿尼西莫夫在讨论会的结束语中，则提出了人的完整性问题，并批评了作家别尔戈丽茨等的一些观点。他指出，关于爱情、正直、善良、信任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概念，但是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不能忘记人所创造的历史，也不能忘记人本身，不能忘记其面貌和历史活动都很复杂的人本身，“人的完整性乃是组成真正人道主义观念的基础。这意味着，英雄气魄、勇敢坚强、坚定不移、无畏精神，同爱、正直、义务、信任是同等重要的。”（《人道主义与行动》）

三

六十年代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想热潮，持续的时间很长，也许可以说，它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从最近时期的进程来看，也有某些新的特点。如果说六十年代人道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其特征是特别强调了“个人是有自身价值的”这一思想的话，那么后来的时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则进入了“人道主义内容的深化、复杂化”的过程。首先，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了，其观点也较全面了。从方法论角度看，是“明显地倾向于综合分析阶段”。批评家库尔吉尼扬指出，“对于今天的批评来说，有典型意义的不仅是对所有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对其价值观点的兴趣，而且还有使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变得更深刻、更精确的要求。如近几年来一系列文章、讨论意见所表明的那

样。这些探索表现在将研究作品的伦理人道主义问题的批评政论方法与美学方法融为一体，将激情、政论叙述的生动性和分析作品的社会现象、艺术形式的科学客观性和准确性融为一体这样的尝试之中。”①有些批评家在概括最近时期人道主义问题的特点时，认为当前苏联文学人道主义的概念具有某种“立体镜”的性质，也就是说，作家、批评家都从多方面、多角度地接近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条渠道，一个层次。他们认识到，人道主义概念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它包容着要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所有观点，同实现人的可能性的阻力针锋相对的态度，对有益于人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展望和对人是‘最适合于……人类本性’（马克思语）的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体现者的肯定。”②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连结历史过程和人类文化的环节和核心。它是各个历史时代的继承性和运动的指示标，是文化之间交流的独特的渠道，是社会沿着上升路线运动的标志。”③因此，必须“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接受、运用并捍卫人道主义的概念，保持这一概念的完整性、多方面性和丰富性。”④

其次，对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也明显地加强了。

盖伊最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人道主义是美学范畴》。文章对人道主义同文艺的关系作了极其深刻的理论阐释。他指出，“艺术在其最本质的表现中，与真正艺术创作的人道主义倾向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他认为，伟大艺术家作品中的艺术发现，在于：在反映生活的本质方面时，在揭示性格和环境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时，是把“完全的人”（莎士比亚语）作为

①见《当代苏联批评中的人道主义概念》。

②盖伊《人道主义是美学范畴》。

③同上。

④同上。

美学理想加以肯定的。换句话说，“实现完全的人的理想，把人从畸形的社会矛盾中解放出来，并建立有助于揭示人类的人的社会——这就是真正艺术的核心思想。”①

库尔吉尼扬也指出：“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合理地理解为不仅是与作品的主题层和典型层相关的问题。这里谈的也是艺术形象、方法、诗学的人道主义本质和对研究这一本质的专门手法的探讨；不是以某些主观的、一知半解的‘以新代旧’为基础，而是要遵循历史主义的轨道。”作者列举了一系列的著作，如谢尔宾纳的《我们的同时代人·二十世纪文学中的人的观念》，盖伊的《文学的艺术性》、德聂普罗夫的《文学和人的道德经验》等，认为这些著作都很好地“论证了人道主义概念同马克思主义艺术概念、同艺术本身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联系。”②

许多批评家都反对把文学、把人的性格缩小为只是表达某种单一因素的形形色色的观点。他们指出，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康德的绝对命令，弗洛伊德的及其门徒的实证主义解释（下意识、性欲）等等错误观点，都给艺术带来过不可弥补的损失。批评家们强调指出，任何艺术家，如果不从人的性格丰富性出发，如果拒绝“完全的人”的理想，他们就不能把思想体现出来。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伟大作家，都认识到必须有全面的，完全的人的个性思想的内在联系及与这一点相适应的优越的社会制度的思想。因此“可以完全明确地断言，在人类历史时期里，艺术是在发掘完全的人的理想的标志下，在为全面的人的个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条路线上，人类的命运和艺术的命运原来是在极深的层次上以最重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这些方面甚至好像是相互制约的。”③

文学是“人学”，这是由高尔基首先提出的。后来有不少理论家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是，还很少象今天盖伊那样，直接称人道主义是美学范畴这样明确的提法，在探讨人道主义与文艺的

关系方面，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而且许多文艺家都已经明确认识到：“丰富文学的人学内容——这是在革命和社会主义中产生的艺术的伟大功绩，没有这一伟大历史功绩，就不能想象当代艺术的进步。”④

第三，加强了对待人道主义问题的辩证态度。前面曾提到，在六十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中，一个突出特点，是特别强调了个人的价值问题。当前的评论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狭隘性，从而更加注意了个人与社会、人与人类的辩证关系。鲍列夫在《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及二十世纪的文学过程》（1982年）一文中，在分析苏联一系列作家作品时，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作品中“鸣响着的不只是个人对社会负责的传统主题，而且首次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对个人命运和幸福负责的主题。一个人应当献身于人们，做一个为别人的人——否则，个人主义的孤独就剥夺了生活的意义；离开社会的个人的发展，反而会走向退化；但是，离开人，不管人，违反人的利益的社会发展，实际上也同样是一种倒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力求唤醒人身上的善，甚至寻找同恶进行斗争的那种有分寸的，使目的与手段、否定与肯定、强制与信念、破坏与建设相适应的手段。手段的破坏作用不应当超过目的的建设内容。没有人道主义以外的进步，也没有社会进步之外的人道主义。”批评家潘科夫把当代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认为这种人道主义是“公民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与“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是格格不入的，同对‘个人因素’的不顾一切的崇拜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人道主义“建立在个人和社会相互负责的思想，建立在对人的‘严格要求的爱’

①盖伊《人道主义是美学范畴》。

②库尔吉尼扬《当代苏联批评中的“人道主义”概念》。

③同①。

④谢尔宾纳《当代文学中的个人概念和人道主义准则》。

的思想上。”在现实的人道主义中，“承认人的价值和自主权是同承认道德力量和社会义务是相结合的”。“这种方向标的两位一体性质在现实的人道主义概念中乃是根本的东西，它既对社会历史的实践，也对人的行为起准绳的作用。”潘科夫认为，当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对‘精神生活’的关心，对转到人的行为路线上的人民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关心同合理地关切‘周围生活的需求’结合起来了。”①此外，苏联批评界对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人道主义的解释也有些新意。如帕利耶夫斯基写道：肖洛霍夫“在象个性这样的概念面前是毫不动摇的。不是否定它，而是毋庸置疑地尊重它。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自由地逾越它。对个人，不排斥怜悯和同情，但是，同时也可以去制止他，劝服他，让他在巨大的整体混合物中磨炼。这样，在不断地运动着的矛盾中间，我们就不会忽视任何一方面，不会否定人道主义的异乎寻常的规模。”②鲍恰罗夫认为，这段话对肖洛霍夫作品人道主义作了“合乎现代意义”的解释。帕利耶夫斯基的辩证法是：一方面反对夸大个人，另一方面又反对把人归为乌有的观点。

过去也有不少批评家谈到人和人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应该说，象鲍列夫和潘科夫、帕利耶夫斯基等这样细腻、全面和辩证的观点，过去还是不多见的。这说明，在人道主义的问题方面，苏联文艺学家的确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批评家的辩证态度也表现在对待“一般的人”的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中，艺术对象不能只是一般的人，只能是改变世界的英雄，把“一般的人”与“抽象的人”等同看待。当然，鼓吹“抽象的人”是错误的。但是，“一般的人”这个概念是否就是“抽象的人”呢？近来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解释。盖伊指出：“改变世界的人”在该时代的不同具体历史形态下，丝毫不能离开“一般的